

近现代史专题讲座

马昌海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近现代史专题讲座

马昌海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现代史专题讲座/马昌海著.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5.11

ISBN 7 - 80199 - 334 - 9

I. 近... II. 马... III. ①中国—近代史②中国—现代史 IV. K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13320 号

书 名 近现代史专题讲座

作 者: 马昌海

责任编辑: 齐 人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 6 号院 1 号楼

邮 编: 10008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2.4 千字

印 张: 9.25

印 数: 0001—2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199 - 344 - 9/K·265

定 价: 22.00 元

作者简介

马昌海，1950年生人。北京服装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1968年初中毕业，赴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下乡插队，1972年进工厂务工。1978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后在中学任教。1985年至今在北京服装学院任教。1987-198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进修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课程。

目 录

绪论：中西现代化道路的比较	(1)
(一) 文化概念的层面	(1)
(二) 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进程	(2)
(三) 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	(3)
(四) 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任务	(8)
第一讲 小农经济基础与君主专制制度	(14)
第二讲 中国近代的若干问题	(20)
一 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化与终结	(20)
(一) 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认识	(20)
(二) 世界新潮震动了中国	(22)
(三) 中国社会在 20 世纪初的转化及其归宿	(25)
二 从统治集团的分化演变看晚清政权的衰亡	(31)
第三讲 红色航船的起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 代表大会前后	(36)

第四讲 1930年代中共地下斗争 (51)

(一) 周恩来在上海 (1927—1931年) (54)

(二)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地下斗争的危害 (62)

(三) 1936—1937年北方烽火中的刘少奇 (63)

第五讲 国民党统治的建立与实质 (67)

一 蒋介石如何取得国民党最高权力地位 (67)

(一) 孙中山逝世之前的蒋介石 (67)

(二) 蒋介石混水摸鱼三部曲 (71)

(三) 蒋介石与各派势力在北伐战争之后的
明争暗斗 (75)

(四) 蒋介石在新军阀混战中的远交近攻三部曲 (77)

二 南京国民政府的“关税改革” (83)

三 官僚资本主义的兴衰 (92)

第六讲 对日本侵略战争若干问题的回顾与反思 (105)

一 日军暴行的历史文化根源 (105)

(一) 日军的凶残与暴行 (105)

(二) 日本人的宗教观念 (119)

(三) 功利导向的道德相对主义与耻感文化 (125)

(四) 武士道精神对军国主义形成的影响 (131)

(五) 日本民众在对外侵略战争中的态度 (136)

(六) 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分裂 (147)

二 日本军国主义阴魂缘何不散	(153)
(一) 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对侵略战争的美化和 否认	(153)
(二) 军国主义阴魂不散的历史与现实原因	(160)
三 钓鱼岛问题的来龙去脉	(176)
四 中国对日索赔之问题	(184)
(一) 国民政府对日索赔的历史回顾	(184)
(二) 新中国政府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偿	(188)
(三) 民间受害索赔的开展	(192)

第七讲 建国初期的若干重大事件

一 中苏同盟的建立	(195)
(一) 建国前中苏两党的若干重要接触	(195)
(二) 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	(201)
(三) 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207)
二 中国出兵朝鲜决策前后	(216)
(一) 朝鲜战局突发逆转	(216)
(二) 中国出兵援朝的决策	(224)
三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34)
(一) 彭德怀指挥的五次战役	(234)
(二) 朝鲜战争中的中苏同盟关系	(247)
(三) “边谈边打”的艰难历程	(255)
(四)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	(264)
四 “三反”、“五反”运动	(268)

（一）“三反”、“五反”运动前的社会经济形势·····	（268）
（二）建国后反腐倡廉的第一枪·····	（270）
（三）“五反”运动始末·····	（277）

对解决《中国革命史》课与中学历史课内容“重复”

问题的看法·····	（281）
（一）两门课程存在重复的教学内容和史实·····	（281）
（二）中国革命史课应在加强理论教育中深化教学·····	（283）
（三）中国革命史课应对某些史实加以补充·····	（285）

后记·····	（287）
---------	-------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所进行的改革、革命和建设，都可以看成是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阶段。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情的不同，从物质文化层面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到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和革命，再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走了一条与西方的现代化截然不同的道路。了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意义，进而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更为先进制度的条件下，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比西方更为迅捷的现代化道路。

绪论：中西现代化道路的比较

（一）文化概念的层面

一般说来，人类文化可分为三个层面：1. 物质文化：包括房屋建筑、器具等人类创造物，以及反映人们创造这些物品能力的工艺、技术、科学等，也就是一般所讲的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成果和结晶。2. 制度文化：为了使人类社会能够正常的运行和发展，需要调节社会矛盾和社会关系，尽可能地完善社会管理，人类创造了各种政治制度、政治理论、法律、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等，也就是一般所讲的政治文明，包括了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在内。3. 精神文化：也就是一般所讲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包括哲学、宗教信仰、价值观念、文学艺术、审美情趣、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区别文化时代性的主要是物质文化和制度文化，也包括精神文化；而区别文化的民族性的，则主要是精神文化。这三类文化形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一类形态的变化，也会影响其它两类文化的变化。

(二) 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进程

所谓现代化，应包括物质、制度和思想三个方面。将中国与西方现代化道路的进程做一个简单的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的现代道路走过了从思想—制度—物质的历程，并基本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却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留下了缺憾，中国的现代化至今还没有完成。

从认识的形成来说，是先有实践后有认识。但从认识的指导作用来看，方向则相反，是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再到实践中去。在实践过程中，原有构想中不切实际的地方会得到纠正，其中正确的东西，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丰富。对于社会科学方面的认识来说，运用于实践的过程又表现为先解决思想政治问题，后解决经济问题。欧洲近代的历史发展十分清晰地展示为这样一条路径：在意大利首先发生了文艺复兴运动，批判神性、弘扬人性，批判神权、弘扬人权，文艺复兴运动很快席卷欧洲，历时数百年。与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洛克、霍布斯等人的思想成果交相辉映，在法国又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启蒙运动。这些波澜壮阔、广泛深刻、旷日持久的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其主要内容就是批判旧制度、旧思想，为新制度的诞生探索道路、寻找方法、制造舆论，教育和发动民众。经过数百年的精神准备和思想宣传之后，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活动才由思想领域进入政治实践。资产阶级革命向整个世界贡献了“自由”、“平等”、“博爱”和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成果，从此专制的一页成为黑暗的过去，以至“整个 19 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美利坚民族集英法德意之大成于一身，最终完成了始于英法德意的思想革命，这一革命的成果使人的自由个性弘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得到肯定，人的

能力得到开发。而思想一旦冲破牢笼，就必然迸发出惊人的生产力，创造出惊人的科技文明成果。欧美资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并初步站稳脚跟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取得人民的支持，他们进而大力发展经济，由政治制度领域又进一步深入到经济实践，当工业革命取得巨大成就，资产阶级有了强大的经济力量之后，巩固新制度的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根本解决，封建主义的复辟也就不再可能。工业革命创造了市场经济这个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形式，机器的发明将劳动生产率大大提升，分工又导致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由此又派生出一系列的现代管理制度和市场贸易规则，使欧美各国在世界上率先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此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虽然遭受了多次经济危机，但由于其不断地调整和改进，所以，从总体上讲，仍然是走上了一条相对快速发展的道路。

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已经证明了从思想到政治再到经济这条路径成功的可行性。而在我们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却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

（三）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进程

鸦片战争的失败，震动了中国的有识之士。一些仁人志士开始高呼救亡图存，他们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只看到人家的坚船利炮。由于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他们不可能知道：西方列强之所以拥有坚船利炮，是高水平的科学技术及先进生产力的产物，是因为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新兴资产阶级掌握了政权。而他之所以能够掌权，是由于其做了长期的思想、理论和舆论准备，从而有了受到教育、素质较好的国民。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历史已经证明：要想推动社会进步，就应该在思想理论方面加强舆论宣传，从教育和提高国民的素质着手，进而夺取政权，再

全力推行经济建设。而在我们中国，封建专制制度是神圣不可改变的，在当时中国的许多有识之士看来，博大精深的儒家学说是野蛮的西方“夷狄”所望尘莫及的，我们缺少的仅仅是洋枪洋炮，那么解决国家强盛的方略也就十分简单：“师夷长技以制夷”。与曾国藩一起镇压太平天国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在攻打南京城的前夕到城外察看地形，只见长江中的一艘外国船舰冒着黑烟马达轰鸣，飞速地逆流而上。看到此景的胡林翼昏了过去，醒来后他说：“这个世界要变了”。他看到了历史的转折点：来自西方的工业文明已经到了中国，这个力量比眼前的太平天国要强大得多，这才是中国真正的对手，一个新的世界就要到来了。于是，封建统治集团中一批比较有见识的官僚，开始推行轰轰烈烈的洋务新政，从西方引进近现代的科学技术，建立起中国的第一批近现代工业企业，翻译出版了一批西方科技书籍，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近现代科技人员。洋务运动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方面迈出了第一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体现了它的保守和守旧，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思想意识是绝对不能触动的。即便是这样有限地向西方学习，也遭到了封建顽固派的百般刁难、重重阻挠和强烈反对。马克思在 1859 年论及中国时说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而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将在一场殊死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全集》第二卷，第 26 页）。面对西方外强的咄咄进逼，顽固派首领大学士倭仁就鼓吹“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主张以“礼仪为甲冑，忠信为干橹”。主持洋务活动的恭亲王奕訢对此驳斥说，这

种空话“无益于自强实际，二三十年来，中外臣僚正由于未得制敌之要，徒以空言塞责，以致酿庚申之变”（指1860年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城，火烧圆明园，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1872—1875年，洋务派大官僚同意中国第一个留学美国的容闳的建议，由容闳主持选派了120名幼童赴美国学习现代科技文化。后来由于顽固派的反对，只有詹天佑等两个人最终完成了大学学业。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化是由资产阶级完成的，但中国因没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因而没有成熟的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无力承担近代化的使命；封建顽固派反对近代化。在前所未有的世界大势迫使中国人做出选择时，开创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便落到了地主阶级开明派（洋务派）身上。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权益，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仇恨，而要抵抗西方列强的侵略，实现中国的独立和富强，却必须要向敌人认真学习。这不仅需要冷静的理性，更需要很大的勇气。由于晚清现代化并非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而是对西方列强挑战的被迫回应，统治者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因此现代化只能是发生于城市社会的孤军突进，而农村却被抛弃在现代化的进程之外。这既给农村造成灾难，使现代化自身陷入困境，也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清王朝覆灭后，现代化与农村社会的矛盾在动荡中与战乱中进一步加剧。中国的现代化由此便出现了一个二律背反：现代化的目的之一在于实现对农业社会的改造，而对现代化最顽强的抵抗，正是来自这个被无情地抛弃在现代化之外的农村，这个农村与其它反现代化的因素一起，共同造成了中国现代化启动不久后的顿挫。这一历史事实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昭示：农村的地位及其扮演的角色对于现代化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

1885年中法战争前后，一批参与洋务活动的有识之士针对

洋务运动的严重弊端，提出了在政治体制层面进行变法的主张，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变法思潮。变法思潮酝酿发展 10 年，终于在 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形成了一场政治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粉碎了洋务派的迷梦。由于缺少思想启蒙和政治革命这两个前提，只是企图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在不触动旧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实行工业化，洋务运动就注定要失败。而在中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一方却是在 1868 年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启动的，只搞了 26 年“明治维新”的日本。推动“明治维新”的不是洋务派封建官僚，而是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和比较开明的明治天皇。“明治维新”不仅提出了类似洋务运动的“置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口号，还提出了不同于“中体西用”的“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纲领，从物质、体制到思想观念全方位的变革，使新兴的日本打败了拥有号称亚洲最强大的北洋海军、综合国力强于日本的老大中国。比物质武器更可怕的是制度和精神的力量，在北洋海军 1888 年成军后再未添一舰一炮，其设备逐渐老化之时，慈禧太后却动用超过筹建整个北洋水师所需的款项，整修了颐和园，以便其过 60 岁生日。而日本却在从天皇到普通国民，都一起出钱筹建加强海军，连小学生平时玩的游戏，都是打败定远、镇远舰！只有到了甲午战败，才使中国的朝野上下受到真正的震动，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只搞经济建设发展科技，而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和科技是搞不好的。于是出现了戊戌变法，目的是以君主立宪政体代替封建君主专制，这才呈现出鲜明的时代主题——近代化。维新变法派所提出的“自强自立”的口号同样使其处于两难的境地：自强意味着西化，自立却不能也不敢全盘西化，而只能是立足于中国的国情。甲午战败之后敢于提出向敌国日本学习，承认敌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优于被侵略的祖国，很容易被指斥为“汉奸”、“媚敌”、“卖国”。只有如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有胆有识者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在甲午战败之后提出“借法自强”。而以西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不仅掌握着完整严密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有传统的封建思想作为精神支柱，这一切都是刚刚从封建母体中脱胎不久的新兴资产阶级所不能比似的。由于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维新派的理论思维能力和政治成熟度都远远不够，他们也不具备发动广大农民阶级的胆识和才干，其“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悲壮结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20世纪初，由于戊戌变法和庚子战争而引发的矛盾和不满，加之义和团运动的震撼和八国联军的打击，清王朝为了摆脱严重的内外危机，被迫实行“新政”改革，百日维新后被清政府取消的变法措施基本恢复实行，清政府被迫充当了戊戌遗嘱的“继承人”。十年“新政”的结果，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和新式知识分子的力量有所增长，西学也有了进一步的传播，中国已不再是原先那种纯粹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清王朝在历史潮流的逼迫下为自己培育了掘墓人。就近代历史而言，中国资产阶级的主体始终不赞成民主革命而主张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向其开放政权，以完成中国的体制转化，他们连续发动了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并得到清政府18个省地方督抚长官的支持，要求速开国会并成立责任内阁。只是在国会请愿运动失败后的一个短暂的时间里，资产阶级立宪派才对革命党人有过比较一致的支持和联合。在辛亥革命的准备和发动过程中，真正参加革命的资本家为数甚少。而革命党人主要是由一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就其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来看，大多相当于小资产阶级，“小资产者干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468页）。这些人有知识、见识广，在政治上比较敏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和民众的困苦使他们容易接受革命思想，走上革命道路。不管他们的主观愿望如何，历史却赋予了他们充当民族资产阶级代

表的使命。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反封建思想斗争的任务却仍然是长期艰巨的。由于辛亥革命缺少长期的思想准备，缺少思想文化革命的先导，人民群众的认识尚未转变，多数中国人的思想认识水平还如同鲁迅笔下的阿 Q，只是以为北京的龙廷又换了皇帝。所以封建制度很快又在中国借尸还魂：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而后军阀象走马灯似的更换一幕幕丑剧。“民国”徒有虚名，虽然换掉了大清的招牌，可封建专制极权的实质却未根本改变。由于中国独特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从鸦片战争直到“五·四”运动，始终未能走上推动社会快速发展的道路，从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的赶超机会，变得愈加落后。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吴虞等人认识到，要变革中国必须先解决思想启蒙的问题，于是他们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批判封建思想，宣传科学与民主的现代思潮，力图在思想文化领域给辛亥革命补课。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也一度出现了较好的发展势头，至 1936 年达到了旧中国经济发展的顶峰。然而好景不长，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再一次失去了迎头赶上世界潮流的时机。

（四）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任务

《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共产党人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在全世界建立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统一，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实现了社会政治体制的伟大变革，社会主义制度取代了封建买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即半殖民地

半封建的政治制度。中国革命胜利之后，本应集中精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彻底清算延续了 2000 多年的封建思想，以完成现代化道路上的这两项艰巨而伟大的任务，使中国成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建国以后的经济建设也曾出现过好的发展势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了积极地探索和实践。1957 年以后，由于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头脑发热，加上复杂国际环境的影响，中国出现了“大跃进”，给国计民生带来深重灾难。之后，“左”的思想进一步占据了主导地位，逐渐偏离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终于酿成了“文革”浩劫。

“文革”结束后，许多人探究 1957 年后“左”的错误形成的原因，认为这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封建主义的阴魂不散，终于导致了“文革”十年的封建主义复辟。历史学家黎澍率先指出：“不重视对有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坚决清除旧制度的残余，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乘机在各个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暗中取代社会主义，还要冒充是最革命的”（《历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所以，不反对封建主义，就会丢掉科学与民主的精神，也就不能建设社会主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中共党内元老、老一辈革命家李维汉也对“文革”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思索。李维汉认为：为了从根本上挖掉“文革”这一祸根，就必须把肃清政治思想上的封建遗毒，作为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提出来。李维汉说，“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过去的反封建只是在经济上改变了生产关系，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政治上彻底粉碎了封建上层建筑的统治，这是伟大的胜利。但是从根本上对思想理论上的封建遗毒进行清算，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